

## 与敌共眠：现代希伯来文学中的“民族媒介”

[以色列]伊戈尔·施瓦茨\* 钟志清 译

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生存了近5000年，在这期间，他们经历了许多重要而神奇的变化。但是只有在19世纪中叶，这个民族中的一些精英决定重新创建犹太民族。他们选择了抛弃两千年的“六三”历史，创造取代“旧犹太人”的新希伯来人，这些人更为强壮、英俊，更适应现代社会。“人类工程”(human engineering)是我从基因工程领域借用的术语。在新希伯来文学中有许多呈现。自1850年代开始，一批希伯来语作家致力于民族使命，在其作品中展现出人类混合模式，进而产生了多样而不同凡响甚至非常怪异的“新希伯来人”。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将讨论这一系列“混合”模式。

—

巩固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经常会与恐外症联系起来。该丑陋现象在文化媒介中具有多种表达，文化媒介在该语境中反映出时代倾向，承认其合法性，并且是促进与散布“教训”的因素之一。然而，也有相反的倾向，被多数文化研究学者所忽略，也许原因在于“善于批评”的学者喜欢谈论丑陋现象。

不管怎样，审视数以百计想象复兴一个民族的文本，则会看到其中许多文本精确地提供了通过与“敌人”进行密切联系而巩固民族实体的例证。这一现象成

---

\* 伊戈尔·施瓦茨(Yigal Schwartz), 1954年生,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 本—古里安大学犹太和以色列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获得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文学博士。迄今已经出版10本专著和多篇论文。其著述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等文字。代表作有英文专著《从个体悲悼到部族永恒:阿佩费尔德的小说创作》(2001)、《犹太复国主义的悖论:希伯来文学与以色列认同》(待出版), 希伯来文专著《优势》(2005)、《你是否认识那片生长柠檬的土地》(2007)、《没有教堂的信仰者》(2009)、《作家膜拜与国家宗教》(2011)、《阿什肯纳兹》(2013)等。



为所有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但由于我的主攻方向是希伯来文学,因此便从三种带有文化构成特征的希伯来文本中对其加以证实。

这三种文本将被分为两类。前两种通过生于欧洲、成长于欧洲的作家来表现这些想象行为。第三种通过那些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以色列主权国家里的作家来表现这些想象行为。

从第一类文本的产生到第三类文本的产生,期间相隔了110年之久,然而这两类文本拥有四种共同特征。首先,在所有类别的文本中,有某种实验室,在实验室里把女人和男人混合起来,目的在于形成绝配。第二,这种“基因工程”进程发生在具有血缘和宗教关系的人群当中。第三,这些关系通过渗入选择一个“涉外”婚姻的做法而出现偏差。第四,对其加以回顾,则可清晰看到这一偏离对完全实现故事中的正确婚配非常重要。

似乎应该在此指出,通过把“涉外”婚姻引入共同体之中改进民族共同体的基因库并非新生事物。在古代文本中就已经有多种表述。《旧约》中的《路得记》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证。《路得记》讲述的是摩押女子路得与婆婆拿俄米相依为命的故事,拿俄米逃荒到摩押,在丈夫和两个儿子去世后,与儿媳路得一起回到以色列。婆媳二人极其贫穷,靠路得在波阿斯地里捡麦穗为生。波阿斯是拿俄米丈夫的亲戚,一个勇敢的富人。他也表现得颇为慷慨,对女人具有品味。他在所有拾穗人当中注意到了路得,最后娶她为妻。

然而,居住在以色列地的希伯来贵族的代表和一向与犹大国为敌的一个民族的女子联姻,导致了以色列王国奠基人大卫王祖父俄备得的诞生。

## 二

在创作对现代犹太民族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圣经》历史小说《锡安之恋》(Ahavat Zion)之前,亚伯拉罕·玛普(Abraham Mapu,第一位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家)无疑读过路得的故事。小说情节发生在《圣经》时期的犹大王国。中心故事写的是两对青年男女塔玛与阿默农、蒲妮娜与特门的爱情。塔玛和特门是一对兄妹,阿默农和蒲妮娜也是一对兄妹。他们的家庭在耶路撒冷属于最高级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阶层。其爱情事件始于发生在两个家庭的父亲约拉姆和耶狄迪亚之间的一场带有象征意味的事件,两位父亲在橄榄山相遇,握手宣称:等孩子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就让他们成亲。由于一系列的阴谋诡计,事情变得复杂化了,约拉姆的妻子娜阿玛在战争中被俘,被迫从耶路撒冷家中逃走,以错误的身份与孩子们一起在乡间漂泊,根据季节需要干活谋生。然而,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未能阻挠离开父亲庄园的特门和塔玛爱上了阿默农和蒲妮娜。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事情在家庭层面与政治层面都变得愈加复杂,在这过程中,扎马里的形象被烘托出来,扎马里是来自遭到毁灭的以色列异教王国的难民。扎马里是故事中一个“邪恶的外族人”。他是单身,乐于破坏并毁灭与复兴统治王朝相关的一切。

所有这些复杂情势,迅速得到解决,主要得力于“好的异族人”哈多拉姆,哈多拉姆是家里的朋友,来自西顿。小说结尾,两对年轻人在橄榄山,在当年父亲们指腹为婚的地方举行了婚礼。

表面看来,《锡安之恋》是一部单纯的历史小说。但实际上,它是一部深奥微妙的作品,系统而具体地呈现出一个民族共同体复兴的基因工程。该书中心论点是:民族国家是不好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意思是介入到民族基因组当中,插入到锡安、民族和婚配中的基本因素——爱情之间的深入联系之中。

然而,从根本上变革基因组的愿望,至少在故事表面上看,并不适合赢得一种婚姻选择,至少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是同样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两对兄妹之间的婚配。也就是说,最终还是停留在家庭内部。

那么,由此衍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玛普要营造小说中的所有剧变?该问题拥有一个重要答案:小说中的所有剧变与人格化的母题相关,其核心便是体现出娜阿玛家庭身份的卑微。实际上,特门和塔玛,这一对注定将拥有财富的家庭成员选择了阿默农和蒲妮娜的做法,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它表明了社会和阶级的决定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此处蕴含着革命的种子,就像在摩押女子路得故事中所实现的那样。暂时的干扰过后,民族的未来保存在约定俗成的城市精英之手,但是这种情况需要未来一代在乡村,甚至在贫困的乡村里待上一段重要的时间后方能实现。

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矛盾乃是玛普具有开创性奠基之作的基本范式。它证明了对城市的背离,以及对乡村的明显偏爱。而到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赫茨尔(Theodor Herzl)笔下,情况恰恰相反:在赫茨尔那部具有乌托邦色彩的长篇小说《古老的新国家》(*Altneuland*, 1902)中,以色列地是一个农业区,正经历着越来越迅速的城市化进程。

这两部作品在几个层面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在此最令我们感兴趣的乃是基因工程原理,其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玛普试图通过创造自然生命的崭新联系,来打破城市统治阶层的凝滞。赫茨尔采取了与之类似的政策,但是在他的书中,犹太人被视为亲近自然,并取代了自然。

《古老的新国家》中的人物主要分为东欧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两类。中欧犹太人被描述成受过教育、有文化修养,但无力把握生活。相反,东欧犹太人被描述成没有意识到现代革命的成果,但同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

书中的中心婚介行为是在已经同化、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弗里德里希·洛温



伯格(Friedrich Loewenberg)博士和米利亚姆·里瓦克(Miriam Livak),一位出身于东欧的犹太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然而,赫茨尔人类工程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与玛普不同,他对自己选定的主人公并不满意。玛普选择塔玛和阿默农作为民族未来的理想代表。这两位年轻人都充满了活力。但赫茨尔以一种较为扁平的方式来塑造未来的民族代表。他们二人相对来说年龄要大,缺乏性欲。他们之间之所以建立起一种联系,是因为陪伴绝望的弗里德里希的德国贵族绅士金斯考特(Kingscourt)的积极相助,这一点非常明显。

赫茨尔选择伴侣的弱点在他们的结晶——孩子弗里茨身上得到明显体现,这个孩子患有严重疾病。他作为未来使者的耐力值得怀疑。当他身体好转后,这一疑虑便被打消,但是这里展现出整部作品的婚配问题,这种康复只有在金斯考特的帮助下才有可能。

金斯考特是一位普鲁士军人,仇恨人类,尤其仇恨女人(与玛普笔下的扎马里一样,他也是单身),为弗里茨心醉神迷。他夜以继日地坐在他的身边,给他唱一首德国歌曲《直至他康复》(*Until He Recovers*)。这便是这一“外人”拯救弗里茨,间接拯救整个家族而进行的干预。

其意义在于:在赫茨尔乌托邦小说的正面,弗里德里希和米利亚姆是选定的伴侣,但是在其背后有一对更受喜爱的伴侣:“孙子”弗里茨和“爷爷”金斯考特,后者标志着一种想象的可以替代的族系,它穿越几代人,跨过共同体和宗教的界限。

### 三

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以色列建国。玛普、赫茨尔和许多其他作家的幻想瞬间化作现实。那时,出现了一些与历史事件的自然属性不一致,或至少表面上不一致的怪事。那些阅读“国家一代”作家所撰写的第一批小说的读者,将立即认识到某种惊人的特征。首先,多数故事写的是保持单身的单身人群。第二,这些单身男女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总是以灾难告终。第三,在这些小说中,跨越了时至当时仍然小心维护的界限。年轻人之间的性关系偏离了共同体的基因库,抵达曾被并仍被当作敌人的巴勒斯坦人这里。

此现象的例证之一便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创作的短篇小说《游牧人与蝰蛇》(*Nomad and Viper*, 1963),这篇作品是奠定以色列文化的一个重要文本。

小说的中心故事围绕一个年轻女子展开:“格乌拉是一个身材矮小、充满活力的姑娘,大约二十九岁。尽管她还没有丈夫,但我们无人不夸赞她的美德。”显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而易见,因为“尽管她还没有丈夫”这句话,我们都很清楚二十九岁尚未成亲(20世纪50年代末)确实是个短处。

而且,“格乌拉”(Geula)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救赎。这个词在小说中与两个领域的意思相关,两者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是以色列百姓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的救赎;另一方面是格乌拉的性救赎。奥兹通过创造“媒介代言人”创造了这一矛盾,即他按照清楚的逻辑顺序,为格乌拉所安排的“约会”。

第一个被安排与格乌拉约会的人是叙述者本人,一个基布兹成员,单身,身体虚弱,二人的关系无果而终。顶替叙述者的是贝都因人。首先,贝都因人与格乌拉进行了一场微妙的谈话。但是很快,格乌拉把自己变成了殖民地母体。她在与贝都因人的邂逅中占据了上风,于是恐吓贝都因人。但当贝都因人逃跑后,她却幻想贝都因人强奸她的细节。第三场“约会”是个结局。当格乌拉躺在丛林中幻想贝都因人时,一条蝰蛇——作品对蝰蛇的描述与对贝都因人的描述相似——咬了她,给她带来一阵“惬意的”疼痛。

只有通过蝰蛇咬噬格乌拉方可实现性救赎,给新民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类工程赋予了一种强烈的讽刺色彩——其主要目的是创造一种人,可以与他的旧人、新人和环境融为一体。

## 四

时至今日,我所描述的东西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移动。离想象中的犹太民族国家距离越近,对实现想象可能性的疑虑则愈重。这一进程在以色列建国十周年后达到了顶点。奥兹的小说,是同时代数十部小说中的一个代表,在证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未来生存的正义性上,引起了严重的疑虑和焦虑。

在此加以提问。这一问题有几种答案。我提出两点。奥兹及其同事的奇怪回应可能是针对“国家地位震撼”(the shock of statehood)的某种文学实现。在这方面,我是指几代希伯来语作家在“等待一个国家”的实践,想象它,为之建立一个初步框架。然而,无人为使之适应“翌日清晨”(the morning after),当幻想化作现实、需为幻想背后的一切所奋斗的情势而培育他们。

也有可能,对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奇怪回应一点不足为奇。也许在许多犹太思想家将其视为犹太文化精髓的另一种宣言:在愿望、存在与真实性之间,认识论上的鸿沟永远无法横亘。按照这种认识,犹太人总是处在前往以色列地的途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愈是与这片土地接近,与之相隔的距离则愈加遥远。